

新民新语

掩耳盗铃新篇

关尹

最近两天，网上几则这样的消息，让人有些哭笑不得。

广州，部分国企老总选择在单位食堂宴请官员，喝的却还是茅台。只不过，喝之前先把商标撕下。更绝的做法是，把茅台酒倒进矿泉水瓶里；

吉林，一家食品厂老板招待上级的住宅，看似一座朴实无华的农家院，内部却是一流装修，聘请当地顶级主厨，客人甚至可以在里面洗桑拿。

不得不佩服这些人的“智慧”。在中央严令禁止奢侈浪费、铺张宴请的号令下，一些豪华宴请转为地下，排场更加隐蔽，也更加奢侈。地点变了，实质不变，很容易让人想起这样一句成语：掩耳盗铃。

好一个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。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，既是中央指示，更是民心所向。为何有的部门和人员还敢妄着法子顶风作案？一方面，是因为陋习未改、惯性使然。过去大吃大喝、公款消费惯了，突然要扭转过来，并不容易。另一方面也表明，对公款消费的监督不够，大吃大喝的口子还没堵住。

可见，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绝不会一帆风顺、一劳永逸，只需发个通知、喊个口号那么简单。没有从观念上彻底转变，不能在监管上做到更加细致，“请客去食堂，茅台水瓶装”的现象恐怕会越来越普遍。

有什么办法？想起学生时代的考试，考得差最多也就是个不及格，但若是在考场舞弊，轻则取消成绩，重则全校通报甚至留校察看。相比公共场合的大吃大喝，转入“地下”的腐败算是另一种形式的“舞弊”，可谓“错加一等”，他们是不是应该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行？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要加强制约和监督，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。这个笼子的直径看来要更大些，网眼则要更细些才是。李克强总理也说过，“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，政府就要过紧日子”，这个“紧箍咒”不能松。

总而言之，老百姓希望的是管好当权者的车子、票子、儿子，还有筷子。让这些“掩耳盗铃新篇”，别再有市场。

（相关报道见 A12 版·中国新闻）

如何才能不相信涨价谣言？

纪玉

生，不太可能悄无声息地涨价。如果自己没办法判断真假，还是应该求助于权威信息来源。本市有不少居民先向“上海燃气热线”咨询，就比较稳妥。权威部门更有必要及时、准确地回应公众关切。媒体则要传达正确信息，不渲染恐慌气氛。

然而，为何这么多居民轻信谣言？为何在权威部门辟谣之后，还是有居民“抢气”呢？

这次谣言出现的背景是，近三个月来，一些地方确已通过天然气涨价方案，加上天然气定价过低观点一直存在，也增添了谣言的“真实性”。更重要的是，虽然地方调整居民用天然气价格有严格的程序规定，必须事先召开听证会，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，但显然，很多居民没有把“涨价”和“程序”“听证会”等联系起来。假使做个社会调查，看看有多少人知道水电煤气调价前必须要开听证会，结果会如何？如果调价前的程序做得足、做得实，公众充分知晓、参与这些程序，那么，“不开听证会、就不能涨价”的常识，便足以令公众抵御空穴来风的涨价谣言——“4 月涨价”？现在马上开听证会也来不及。

在“抢气”者的心中，涨不涨价只能被动接受，能主动做的是尽量减少损失。看似不理性的行为，其实也是一种生存之道。若公众对民生价格调整的过程缺乏知晓和参与，信息不对称之下，自然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十分敏感，也就容易受到谣言的干扰。调价前的程序，政府是认真走过还是当作“走过场”，听证会

是充分体现各方利益还是“一团和气”，都会影响到法治环境、社会生态，以及公众的决策方式。听证会开成“涨价会”的不少见，更有甚者，在某地的一次听证会上竟通过方案，不再召开听证会——听证会自己把自己给“废除”了。被虚置的程序，结果是被逐渐无视。

天然气等价格事关民生，不是不能调整，而是要调得公开、合理，充分考虑公众的经济和心理承受能力。这些都少不了公众的知情和参与。其实，“抢气”也是为了精打细算过日子，只不过力气使偏了。人们需要的，不仅是权威、准确的信息，还有受到严格遵循、落到实处的程序，来保障能代表自己的声音，确实被听到。

社会公正

田成有

主政者能够实现社会公正。好的主政者往往可以为社会的公正和发展创造条件，但在现代社会，社会公正的实现更多地依赖于良善的制度和法律。就目前而言，让公正成为社会保

持健康活力的稳定器，衡量人们满意度的天平，应以十八大确定的权利公平、规则公平、机会公平为导向，加强社会公平的基础性制度建设。（原刊今日《人民日报》，本报有删节）

收费午休

珠海市金湾区一小学从二〇〇九年秋季开始，对留在学校午休的学生收取「午休费」，占用床位休息的每天收两元，趴在桌上午休的也收费一元。如此，无论学生用何种方式午休，都必须「被收费」。

孙绍波画

傅斯年是“三等人才”的价值观

王石川

一提到这个典故，人们往往赞叹傅斯年“春风大雅能容物”，这话只说对了一半，还可看出傅斯年对做学问者充满敬重，以及对自身角色的清醒认知。现实生活中，一些人位置高了仿佛见识也跟着高了，学问就随之大了，容不得人，也看不起人，这就没摆正自身位置，出现了角色迷失。

回到李方桂的“人才论”上，也许其观点不够准确，但研究机构和高校内不少学者宁愿做学问而不愿做官，确实是事实，在当时可以找出不少例证。哪怕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北大也是如此。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道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：“我在学校领导岗位工作时，要找一个人来做院长或系主任不容易，因为谁都不愿意做，怕耽误了自己的学术研究……”

从李方桂拒绝担任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，到王义道找不到人做院长或系主任，这实在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。在今天，恐怕想当院长或系主任的人，多如过江之鲫吧？媒体曾报道，“深圳（某大学）一个处长职位，竟有 40 个教授来争！”对这些争抢处长的教授，是该抱以厌恶之鄙薄还是该抱以理解之同情？恐怕不可轻易判断。现在的学者为何愿意当官？王义道给出答案：“因为只有当官才有特权和资源，有自己的项目、经费、场地和人员。”还有一种声音认为，“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怪现象，认为学问做得好，就一定要当官，不当官人家就认为你有问题。”

说到底，这就是老生常谈的过度行政化。当权力主宰了学术资源的分配，当学问做得好不如权力更吃香，当教授在行政人员面前噤嘴不敢言，那些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是国王、在权力面前卑微如奴仆的学者，不约而同地选择向权力靠拢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过度行政化确实很危险，也到了该改变的时候，因此，温家宝同志曾强调“现在的教育确实存在许多问题：一是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，最好大学不要设立行政级别。二是让教育家办学。”这是初中肯綮的忧患之谈。还需赘述一句，李方桂后来实在拗不过，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所长，旋即便安心做学问了，在语言研究上成果不凡，著述甚丰，有“非汉语语言学之父”之誉。

新民随笔

谁来当姚明的“队友”

阎小娟

说到姚明，人们惊叹的，往往是姚明之高。但姚明之高，绝非仅在身高。退役后，姚明成了上海男篮投资人，且以熟悉的篮球为切入点，试图带动中国三大球及中国职业联赛的推进。前不久两会上，姚明呼吁中国教育急需融入体育内容。那是因为效力 NBA 时，他对校园体育有了感悟。有了视野之广，探索之深，才有了思想之高。姚明试图追求体育的“更高层次”，“搞体育，表层是为强身健体，更深层次，则是一种精神追求……”

球不打了，人却更忙了，现在的姚明热心于公益。昨天，他出席本报“兰之夜”，不仅见证了上海慈善基金会书画善会之成立，也成为了本报《运动汇》周刊的特邀顾问。姚明认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，理应发挥更大社会作用。行善，姚明一直保持着曝光率，不过，出席活动，他又很低调，一如昨晚执意不肯坐上第一排嘉宾座，“我个大，会挡后排视线……”

虽没得过冠军，姚明的国际影响力，少人能比。体育的功能，并非只有竞技，而更多是一种价值观的传播。在休斯敦，又有多少人，因为姚明，重新认识了中国？其对篮球的探索，对体育内涵的理解，对体坛名人的社会作用，甚至其本身的思想境界、道德水准、文化素养、自身修为等，都堪称中国体育明星之典范。我想，那才是真正的姚明之“高”。

姚明念旧，退役后，重返“梦开始的地方”。接手上海男篮，没给他带来财富的增长，他却依旧倾情投入，对 CBA 之路倾力探索。这理应成为上海体育的一块“试验田”、中国职业联赛的一张“晴雨表”。

俗话说，一个好汉三个帮。姚明再“高”，欲成大事，仍需更多帮衬扶持。上海体育已亮出姚明这块“金字招牌”，欲以他为推动力，打造都市体育文化的拳头产品。目标明确了，不过想要真正经营好品牌，仍需更多人来为姚明“传球”。姚明虽已不打球，但赛场之外，仍需要更多的“队友”，来给他“传球”，甚至“喂球”，让他来个“大灌篮”！别忘了，现在姚明的主场，不在休斯敦，而是在上海，就在你我的身边！（相关报道见 A18 版·体育新闻）